

近代詩歌的「不穩性」與殖民地檢閱 ——《諺文新聞詩歌》（1931年）之 分析

著者：韓基亨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東亞學系教授

譯者：陳允元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中文摘要

這篇論文的企圖，在於全盤性地闡述殖民地朝鮮介於統治者與媒體之間、文學與公共之間的機制。總督府警務局圖書課製作的《諺文新聞詩歌》正提供我們一個有說服力的基礎與解釋線索。這一冊資料集，是為了設定關於朝鮮詩歌文學檢閱機制的客觀化標準的成果。由於詩歌不斷擴張的政治性與令人憂慮的共鳴——朝鮮的詩歌文學、媒體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加強——檢閱的標準成為必需。特別是，有一種看法認為，以韓國語詩歌作為媒介，文學領域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關係密切。

在這層意義上來說，《諺文新聞詩歌》是一份反映結構衝突與從各種形式顯現出文化矛盾現象的重要文件。此資料集的彙編，成為操練檢閱韓國語詩歌的契機，且合理推斷有大量的詩歌在那樣的基礎標準上被刪改。然而，透過標準

的制定，能否完美控制韓國詩歌的「不穩性」？這篇論文的目標，在於建立關於此研究問題的一個理論性假設。

關鍵詞：殖民地檢閱、圖書課、不穩性、檢閱標準、文學大眾化

**The "Seditiousness" of Modern Poetry
and Censorship in Colonial Korea**
— An Analysis for *The Poetry in Korean
Newspapers*(諺文新聞詩歌, 1931)

Han, Kee-Hyung

Professor,

Academy of East Asian Studies,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Translator: Chen, Yun-Yuan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mprehensively elucidate the mechanism between authorities and media, and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he public in colonial Korea. *The Poetry in Korean Newspapers*—by Publications Department of Police Bureau in the Government-General— provides us a persuasive base and inspiration for it . This source book was a result from the objectification process of setting censorship criteria for the poetry literature in Korea. Some censorship criteria became indispensable due to the

expanding political disquieting resonance from the poetry connotation—caused by increas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literature, media and people in Korea. Especially, there was a situation perception for rapid intimacy between literary sphere and socialism through this medium—Korean poetry.

In that sense, *The Poetry in Korean Newspapers* would be an important document reflecting structural conflict and contradiction of culture phenomena brought out in various forms. Compilation of this source book made the moment to practice censoring Korean poetry and it is reasonable to infer that a large number of poems were expurgated on the basis of these criteria. However, through the setting criteria, could it be ever possible to perfectly control the 'seditiousness' in Korean poetry? This paper is aiming at establishing a theoretic hypothesis for studying this question.

Key words: Censorship in Colony, Publications Department, Seditiousness,
Censorship Criteria, Literacy Popularization

近代詩歌的「不穩性」

與殖民地檢閱

——《諺文新聞詩歌》(1931年)之分析

一、帝國之眼、解釋的殖民性

1930年，朝鮮總督府警務局圖書課，在同年一月至三月《朝鮮日報》、《東亞日報》、《中外日報》刊載的韓國語詩歌資料中挑選出134篇加以翻譯，製作成為殖民地檢閱政策的非公開資料集《諺文新聞詩歌》。在此書的序文裡，朝鮮總督府提出作為殖民地詩歌不穩性的明確基準，包括隱喻性地促進朝鮮獨立(革命)之團結鬥爭者、咒罵總督政治而排日者、以及歌詠貧窮以挑起階級意識者三項。

按照總督府的基準，殖民地的詩歌文學被判斷為是否內含反帝國主義的不穩性，並區分其性質。總督府自我強制地將殖民地文學的內容意義限定於強大的先驗框架之中，重新鑄造了殖民地詩歌文學的性格。由於總督府確信反帝國主義的心理與殖民地詩歌之間的關連性，大幅縮減了從其他多元觀點理解殖民地文學作品的可能性。

建立不穩性的基準，也助長了非得從詩歌文學找出不穩痕跡不可的強迫觀念。對於作品的解釋，由於殖民權力的介入，「不穩性」以外的解釋方式難以存在，必然導致了文學教養的凋敝。其結果是，韓國的近代文學，被以超出其內容以上的政治語言來解釋。在文學裡刪除與國家或政治無關係的領域，進而將詩與詩人認知為過度政治性的存在，正是帝國日本的殖民地政策全體主義的本質。殖民性與文學性之間，確實有著不可和解的敵對關係。

舉蔡奎三的〈黎明之光〉為例。此作品被視為「隱喻性地促進朝鮮獨立（革命）之團結鬥爭」的事例。與黑暗、帷幕等的詩語對比，黎明、希望、新春、光、歡喜、凌晨這樣的詩語創造出的「生成意象」，被賦予象徵朝鮮的獨立與革命的意義。總督府不禁認為此詩中對於時間乃至於對自然的感覺，必定係與國家類比。透過這樣的解釋，韓國的近代詩歌因此可說是個人與國家成為同一的存在，個人的感覺轉化為國家情感的觸手。這樣關於韓國近代文學的國家主義式解讀，暗示了其大都因殖民權力的強制而引起。

由於國家與個人的想像力疊合，浮現出韓國人被認為具有對國民國家之不存在的強烈「欠缺意識」。對於獨立國家的「執著的憧憬」，係因「帝國——殖民地」關係的必然產物。此外，殖民權力自身率先將這樣的認識普遍化，是必須注意的。將韓國人描繪為陷入對於國家（nation）過度想像之中的存在，是創造出對立者、進而將侵略與壓抑合理化的帝國心理的典型表現方法之一¹。殖民統治期間，不計其數的所謂「不穩文書」的產生，可說是這樣的帝國政治的副產品。

然而，將文學的意涵以國家預先設定的唯一基準進行理解的「規格化」，是對近代文學自律性的嚴峻挑戰。畢竟所謂文學，是介入現實、反映現實，且同時內含乖離現實的、不可能還原為唯一意義的語言張力，能夠反覆重組成特有的超越時間的意義。儘管如此，總督府的詩歌分類基準，呈現出完全不認同那樣的文學性的態度。這意味著殖民權力係在傳播彷彿「一物一語說」嚴格反映論的美學主體。亦即，「國家美學」的體系，在對文學的檢閱基準的樹立與適用的過程中運作著。

由於作品的潛在意義透過「國家」而被制定的情況存在著，因此為了要保有自己的固有解釋，一定要付出相當的冒險與決斷。這樣的現實，對於殖民地人民的精神結構影響甚大。殖民體制對韓國文學單方面判斷的介入，極度地抑制了往返於現實與非現實之間、或透過與現實沒有直接連繫的方式理解作品內容的可能性。

¹ 關於殖民地檢閱係如何透過文本創造出帝國的對立者，參照朴憲虎，〈文化政治期報紙的位相與反檢閱的內在邏輯〉，《大東文化研究》第50輯（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2005年）。

很弔詭的，這樣的狀況產生了將文學理解的同時代性價值極大化的結果。依照殖民權力的要求，作品的內容閉鎖於當代的意義網絡之中，殖民地文學的主體也必須在這樣的脈絡之中重構自己的對應認識。由於韓國近代文學的歷史圖像被固定為「沉湎於國家與政治之存在」，殖民地作家與讀者能夠獨立理解、解釋作品的可能性，不得不相對地衰弱。

二、詩歌的大眾化與近代文學場域

《諺文新聞詩歌》，係藉朝鮮總督府警務局圖書課主管之手，在將殖民地檢閱政策體系化的過程之中產生的。其調查的意圖，係如何建立殖民地詩歌文學的「檢閱基準」²。由於沒有標準化的「不穩性」可能減弱國家檢閱的客觀性，因此「檢閱標準」的樹立，是建構檢閱政策下殖民權力自我信賴的必須事業。

然而問題的焦點在於：報紙的詩歌何以有獨自檢閱基準的必要，因而成為受到集中關注對象的理由。在殖民地檢閱機構的官憲文書裡，《諺文新聞詩歌》是唯一僅以文學作為對象者。韓國語報紙上的詩歌，儘管在檢閱對象的全體中僅占極小的比例，卻吸引了殖民地檢閱機構的特別注目。

圖書課以在韓國生產、以及運入韓國的移輸入出版物之全體，來作為檢閱對象。在這之中，「具有韓國性」的比例並沒有那麼高。從1925年到1942年為止，受到禁書處分者共計2,789種之中，語言別構成分別為日本語2,359種(84.58%)，韓國語257種(9.21%)，中國語148種(5.31%)，漢文20種(0.18%)，韓國語禁書的比例未滿10%³。在1928年起至1938年的十年之間，受到檢閱扣押的韓國發行書籍是6%(日本45%)，使用韓國語的書籍不過9%(日本語49%，

² 殖民地檢閱資料的體系化，在1926年4月設置圖書課之後得到具體化。從1926年到1936年，圖書課以《朝鮮に於ける出版物概要(在朝鮮的出版物概要)》、《朝鮮出版警察概要》的名稱，非公開地發行了殖民地檢閱相關的「年報」。同時，在1928年9月到1938年11月，定期出版《朝鮮出版警察月報》，經確認共123號。除此之外，圖書課刊行了許多經檢閱的出版物的記事概要與翻譯文、《諺文新聞詩歌》的調查資料集等等。關於圖書課的性質與功能，鄭根植、崔暎姬的〈圖書課的設置與日帝殖民地出版警察的體系化1926-1929〉，《韓國文學研究》第30輯，(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2006年)，有詳細的整理。

³ 韓基亨，〈殖民地檢閱的性質與近代文本〉，《民族文化史研究》第34輯(2007年)，頁440。

中國語 34%)⁴而已。也就是說，如《諺文新聞詩歌》之製作所顯示的，當時，在全體的檢閱對象之中特定的文本所占的分量比例，與殖民地檢閱的集中化程度呈反比之勢。

為了分析《諺文新聞詩歌》，筆者調查了 1930 年 1 月至 3 月的三個月間，《朝鮮日報》、《東亞日報》、《中外日報》三種報紙所刊載的全部詩歌。調查的結果，《朝鮮日報》438 篇，《東亞日報》296 篇，《中外日報》186 篇，總計有 920 篇作品。其中收錄於《諺文新聞詩歌》者有 134 篇，可知對象詩歌約有 14% 被檢閱當局認定為「不穩作品」。

920 篇的詩歌作品，由近代詩 338 篇，童謠與民謠 582 篇所構成，其比率為 1：1.7。三個月間，這些報紙的作品發表者的總數有 469 名，在這之中，僅寄稿一次的作者占全體的 64%，有 303 名。

表一呈現的僅只一篇的寄稿者數與童謠／民謠的比率之高，顯示了報紙有意識地為了作為大眾文學場域的功能而努力。報紙的版面，成為愛好詩歌的多樣文學主體積極的溝通空間。在 469 名作家之中，可確認身分的人物有 61 名，約占全體的 12%。詳細的數字，近代詩作家有 47 名，童謠／民謠作家有 14 名。近代詩作家全體有 184 名，可知身分的有 25%；至於童謠／民謠方面，在全體的作家數 286 名之中，能夠確認身分的有 4.8%。童謠／民謠作家能確認的比率相對低落，因為很可能是他們大部分都屬於習作人口。

表一 每一人的詩歌作品刊載數（1930 年 1 月－1930 年 3 月）

	一篇	二篇	三篇	四篇	五篇	六篇	六篇以上	人員總數
朝鮮日報	109 名	28 名	14 名	15 名	3 名	7 名	9 名	185 名
東亞日報	126 名	33 名	8 名	3 名	2 名	2 名	8 名	182 名
中外日報	72 名	15 名	6 名	3 名	3 名	0 名	3 名	102 名

⁴ 朴憲虎、孫成俊，〈以統計看《朝鮮出版警察月報》的世界像〉，《殖民地檢閱與近代文本》，「首爾：成均館大學東亞學院學術會議」論文集（2009 年 2 月 7 日），頁 86-87。

由不同階層所產生異質性詩歌作品共存的現象，顯示了近代文學場域與報紙媒體間積極的相互關係。詩歌文學有著形式簡單、多樣階層能夠廣泛參與的特性。因此，詩歌文學在讀者大眾與報紙的關係密切這一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編輯群同時提供報紙版面給專業的文學者與一般大眾，其與專業者及非專業者難以共存的小說文類有著根本上的差異，這因詩歌文學的特性而成為可能。

報紙以詩歌文學大眾化的方式來證明，近代文學語可以不被少數專家所獨占的這個事實。近代社會撤廢語言與文學的階級性，實現文學的大眾化，係以將大眾的位置限制於接受者與消費者的特定框架上做為代價。大眾得到了「讀者」這個新的身分，相對地卻被剝奪了作為創造主體的可能性。進入近代社會，聲音語言（譯註：相對於文字語言）的角色被否定，是因為其大致上被認為是時代錯誤的過往之物。

大眾為了成為文學的新主體，必須在近代文字的文化秩序中證明自身的創造力。然而由於並不容易，而普遍存在著透過專業作家確認自身文學創造力的現象。因此，作家成為代替大眾鑄造文學情緒與感覺的存在。

當所有文學衝動必須由文字語言表達此印刷資本的邏輯，成為難以動搖的普遍現象時，作家得到了作為媒介印刷資本與讀者大眾之知識中介者、以及商品生產者的地位。這樣的社會主流現象，可說是獻給近代作家與作品至高讚美背後的運作原理。在這一點上，大眾對於作家的崇拜，是在獨自創造的可能性消失後所產生的、類似補償心理的東西。

從對文學的主體化程度來看，近代的大眾，淪落到比以前的時代更為寒磣的程度。那是因聲音語言而進行的文學場域崩壞，以及文字文學的絕對化所引起的現實。閱讀文本才能形成近代的感性這樣的信念，顯著地提升作家的社會地位，在作家與大眾之間產生了無可撼動的階層差距。特別在因高強度的檢閱、文學作品不得不兼具作為政治語言之功能的殖民地韓國，這種程度更為深刻⁵。

韓國的報紙以饒富興味的方式，試圖解決近代文學所具有除去大眾能動創造性的這個矛盾。詩歌文學的投稿欄，是大眾的表達欲望與報紙的讀者政策所

⁵ 韓基亨，〈近代語的形成與媒體的語言策略〉，《文藝公論場的形成與東亞》（成均館大學出版部，2007年）。

遭遇的空間。報紙創造出近代文學的讀者，使他們參加報紙的文藝欄，最後在他／她們身上移植作為「作家」的可能性，也給大眾提供了能夠享有將文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而主體化的機會。其必然帶來殖民地民間報紙的成長，以及社會位階的提高。

報紙的策略是，從專業的文學家乃至於平凡的大眾，不論是誰都能夠將自己的情感藉詩歌文學的形式表達。如此所構成的報紙文學場域，賦予所有參加者作為近代人的自我意識。讓自己的言語存在於能與許多讀者接觸的媒體空間中，也就意味著可對現實的創造性介入。

在京城發行的三種報紙，在三個月之間刊載了 920 篇詩歌，光憑這個數字就可以產生種種想像。換算成一年的話，大略有 1,200 篇近代詩與近 2,400 篇的童謠／民謠，藉由三個報紙的版面與韓國各地的讀者們接觸。這意味著詩歌文學以報紙這個近代媒體作為溝通的媒介，以殖民地國民文化的形式進行大眾化。正因為如此，詩歌文學創造出獨自的國民性想像力，殖民地檢閱當局不得不對之注意。這裡還可以再指出一點，在這樣的國民文學之上，開始一點點地覆蓋上了所謂階級意識的微妙方向性。必須注意的是，二〇年代後半至三〇年代初期，韓國正值社會主義運動最激烈的時期。政治活動的爆發與大眾文化的興盛並存，是這個時期社會現象的重要特質，使政治的能量與文學的欲望相互衝擊，同時也促進了殖民地文化基礎的膨脹及其性質的再建構⁶。

三、圍繞著文化表象的協力與競爭

報紙的詩歌文學自二〇年代中期開始，正式地指向國民文化的性質。《東亞日報》藉由學藝版面，將婦女、兒童、學生乃至舊知識分子拉進報紙，構成了大眾文學的場域⁷。《東亞日報》為了納入多元的讀者階層，動員了漢詩、時調、童謠、唱歌、近代詩等等幾乎所有的詩歌樣式。報紙的詩歌文學所呈現的「文

⁶ 關於這點，參照千政煥，《近代的讀書》第三章〈1920-1930 年代的讀書與文化之變化〉（首爾：푸른역사，2003 年）。

⁷ 李惠鈴，〈1920 年代《東亞日報》學藝版的形成過程與文學的位置〉，《大東文化研究》第 52 輯（2005 年）。

表二 殖民地時期各年度報紙的漢詩刊載件數

年份	朝鮮日報	東亞日報	每日申報
1920	169	169	399
1921	186	18	798
1922	24	0	620
1923	54	48	644
1924	23	132	647
1925	0	0	255
1926	0	16	75
1927	0	47	114
1928	0	315	130
1929	70	125	415
1930	3	99	218
1931	2	163	179
1932	0	160	101
1933	52	3	238
1934	125	25	154
1935	26	161	44
1936	159	124	213
1937	93	71	318
1938	62	111	330
1939	91	105	437
1940	53	166	323
合計	1,192	2,058	6,622

類的雜混性」，係以強化對讀者的重視及對讀者的支配力為目標的雙重策略下所產生的⁸。

具權威性的報紙持續性地刊載漢詩，讓我們知道了以「文化權力」作為志向的報紙的努力是何等熾熱。表二的統計，顯示了不僅是作為總督府準官報的《每日申報》，乃至於《東亞日報》與《朝鮮日報》等民間報紙，都傾力於舊知

⁸ 朴憲虎，〈從同人誌到新春文藝——登壇制度的權力變換〉，《作家的誕生與近代文學的再生產制度》（首爾：昭明出版社，2008年），頁102。

識分子的吸收。這裡可以窺見，媒體這個制度在近代性與生存環境的反近代性上，在怎樣的層次上有所連結（參照表二的殖民地時期報紙各年度漢詩刊載件數⁹）。

一個應注意的事實是，二〇年代民間報紙實施詩歌大眾化政策的過程，也與社會主義運動結成了密切關係。這是因為在擴大影響力的層次上，民間報紙與社會主義的利害關係一致之故。從 1928 年左右起始的「藝術大眾化論爭」，是一個能夠確認在這樣的接點上發生什麼樣狀況的好事例。

此論爭的焦點之一，是普羅列塔利亞文學運動中，如何設定獲得大眾的方法與合法運動的關係。在理論層次上主導「藝術大眾化論」的 KAPF（朝鮮普羅列塔利亞藝術同盟，以下略稱 KAPF）初期理論家金基鎮，是最積極於在實用層次上將詩歌文學的政治性加以現實化的人物。他的主張是：追求社會主義的藝術家們，必須積極利用殖民地的合法空間來獲得大眾，而詩歌文學能夠成為其重要的媒介。金基鎮的見解可概括為「能夠通過檢閱的普羅列塔利亞藝術，必須具備什麼樣的內容與形式呢」這樣的一段文字。

然而 KAPF 新領導者林和感到憂慮。他認為，以那樣的戰術進行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學運動，終將被吸收於合法媒體的影響力之中¹⁰。林和考慮到，對於合法性的過度傾斜，在殖民地文化權力的力學之中將損害社會主義文化運動的獨立性。

在日本方面，「藝術大眾化運動」在現實上的效果，以相關媒體的飛躍成長來呈現。NAPF（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的機關誌《戰旗》，1928 年 5 月的創刊號發行 7,000 部，1929 年 12 月 17,000 部，1930 年 7 月發行 23,000 部¹¹。然而，KAPF 在設立初期藉由《開闢》的發刊——《開闢》被強制廢刊（1926 年 8 月）後則藉由《朝鮮之光》，僅保留了組織必要版面的一部分¹²。

⁹ 此統計，係根據韓國漢文學研究者韓榮奎、金振均先生的調查。

¹⁰ 金基鎮，〈關於藝術運動〉，《東亞日報》，1929 年 9 月 20 日至 9 月 29 日；林和，〈答金基鎮君〉，《朝鮮之光》第 88 號（1929 年 11 月）。

¹¹ 前田愛著，劉恩京、李元熙譯，《日本近代讀者的成立》（首爾：이름，2003 年），頁 258。

¹² 關於社會主義運動與《開闢》、《朝鮮之光》的關係，參照韓基亨，〈殖民地檢閱政策與社會主義關連雜誌之政治力學〉《韓國文學研究》第 30 輯（2006 年）。

因苛酷的殖民地檢閱造成莫大的文學資源的損失，也是一大問題。由於加盟者的議論分散於種種媒體，KAPF 推動的文藝運動難以發揮集中效果。更加嚴重的是，刊載作品的主導權，始終掌握在合法媒體的手中。林和對於合法活動效果的懷疑，便與這樣的狀況有關。

儘管 KAPF 內部有複雜的論爭，透過詩歌文學，大眾與社會主義的距離卻急速地拉近。1928 年，《朝鮮日報》新春文藝入選作之中有許多因不穩的理由而遭到檢閱刪除¹³。在《諺文新聞詩歌》的不穩資料有 50%以上是《朝鮮日報》所刊載的詩歌，顯示了該報激進的氛圍至少持續到了 1930 年初期。

民謠作為階級文學的可能性，也在這樣的過程中重新受到注目。金基鎮認為，韓國的大眾民謠「阿里郎」適合「傳達煽動不平不滿、鬱憤、鬥志的情感」，是有助於大眾鬥爭的形式，主張藉由民謠改良擴大傳統形式的影響力，是必要的¹⁴。金東煥也將民謠的性質定義為「作為今日普羅列塔利亞前身的被統治群的藝術」，說明其與社會主義文藝運動的關係如下：

現今的新詩極為技巧化、時調極為高雅化、而漢詩極為艱澀，我們能信賴的，只有在形式與內容上如實保有野生狀態的民謠了。當我們感覺，朝鮮民謠的文藝運動與我們的生活運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的時候，更必須盡全力於民謠的勃興。¹⁵

金基鎮「要是詩歌有助於階級意識的覺醒，其缺點、陳腐也就不成問題」¹⁶的主張，儘管問題意識與意圖迥異，卻與當時報紙的詩歌文學策略屬於相同的脈絡。雖然目的不同，報紙與社會主義者的共同關懷，卻都在於獲得大眾。

¹³ 金錫烽，〈殖民地時期《朝鮮日報》新春文藝的制度化樣相研究〉，《作者的誕生與近代文學的再生產構造》（首爾：昭明出版社，2008年），頁157-159。

¹⁴ 1929年5月11日，於水原舉辦的普羅藝盟演講會上合唱「阿里郎」。宋影記錄，此「阿里郎」的作詞者是孔錫禎，由支會員全體合唱。（宋影，〈水原行——普羅藝盟演講記〉，《朝鮮之光》第85號，1929年6月，頁97）。此集會中有金基鎮、朴八陽、林和、柳完熙、尹基鼎、宋影等出席，金基鎮透過此時的記憶，確認阿里郎這樣的民謠的政治性。

¹⁵ 金東煥，〈朝鮮民謠的特徵及其將來〉，《朝鮮之光》第82號（1929年1月），頁76。

¹⁶ 金基鎮，〈為了藝術大眾化〉，《朝鮮日報》，1930年1月1日至1月14日。收錄洪廷善編，《金八峰文學全集 I》（首爾：文學與知性社，1988年），頁166。

然而，大眾的話語與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結合，從殖民權力的立場來看，是非常危險的現象。因為在殖民地大眾動員的理念方向性將會更加明確。《諺文新聞詩歌》的製作，係以報紙的詩歌作為媒介，認為大眾文化的力量與社會主義運動的結合進展至相當的水準——這樣的判斷之下所進行的。

檢閱當局對詩歌文學集中注意的 1930 年冬天，報紙的態度開始產生了微妙的變化。《東亞日報》刊出與以前不同型態的「新春懸賞募集」廣告。此活動的目的是創造「朝鮮之歌」。一個重點是，其形式限定為唱歌、時調、漢詩這樣的舊樣式，也與以生活革新、民族保健、識字運動為口號的啟蒙運動有連繫¹⁷。

懸賞募集廣告以「具有朝鮮性」的綜合來定義「歌」的意義，而問題的核心在於「歌」的形式僅限制在唱歌、時調與漢詩的這個點上。由於「朝鮮之歌」被限定於三種詩歌形式，「朝鮮」與「歌」無法成為專有「過去——現在——未來」超時間民族性的概念。在其延長線上，「歌」的享有主體也被限定在封閉於過去的存在。

將現在的時間封閉於過去的形式之中，《東亞日報》的這種態度，與民族主義的一般認識論並無太大的差異之處，但很明顯地，這樣的決定被認為排除詩歌文學政治性的社會配置重組。筆者認為，這也可以解釋為製作《諺文新聞詩歌》的檢閱當局直接介入的結果。

1933 年 1 月，朝鮮總督府圖書課長清水重夫宣示，要較以前更加提高檢閱的強度。他陳述，「嚴格地抑制阻礙國家之健全發達、違反社會生活之圓滿向上的言論的同時，也不能怠於事前的指導監督。我相信，對於言論的國家控制，在不久的將來必定可以實現」¹⁸。清水的發言可視為殖民權力鼓勵民間報紙右傾化之意志的代言。

《東亞日報》將詩歌文學與去政治性的啟蒙運動連結，係因考慮檢閱政策的強化，為了維護報紙自身安危的行動。《東亞日報》的策略，是一方面接納大眾對「民族」的渴望，又將其性質調整為無關於殖民地的現實政治。《東亞日報》

¹⁷ 〈新春懸賞募集〉，《東亞日報》，1930 年 12 月 15 日，頁 4。

¹⁸ 《每日申報》，1933 年 1 月 1 日。

摸索著既能夠維持自身社會存在感，又不至於與殖民統治對立的方式¹⁹。以大眾與民族文化的連繫作為方針的去政治化的擬古詩歌，便是為了分占殖民地文化權力而進行投機性民族主義的一個例子。其與「藝術大眾化論爭」進行當時，金基鎮將「當代性」賦與舊有詩歌的形式作為革命語言之媒介的看法，在根本上屬於不同的層次。

1937年，林和批判朝鮮詩壇的復古傾向，寫下「只能悲傷地聽見褪色的中世紀餘音」這樣幾近於失敗的判斷。林和指出，進入三〇年代顯著地往「定律詩」倒退，係始於保守的浪漫民族主義，認定作為「最陳腐卑俗的思想與情緒」²⁰的這種傾向是屬於反時代的。

現今的中世紀詩歌的生產者們，起初在新傾向派的詩人們強調生活與詩歌的綜合、詩的思想性的時候，他們是主張著詩的純粹性的。當時，他們主張詩的無思想性，一被批評那正是思想性時，他們就否認。(林和，〈曇天下的詩壇一年〉，1937年)

身為現代主義者也是社會主義者的林和的立場，近代詩形式的倒退，是全盤否定近代詩擔負的進步性的現象。林和以「文化與藝術的臨終」這樣的極端評價，批判當時詩文學的復古傾向。然而這樣的現象，與作為近代詩文學主要生產場域之功能的報紙策略有所連繫，而不能夠以幾個詩人們思想侷限的層次來加以掌握。林和透過詩歌的倒退原因指出的「保守的浪漫主義」(可視為退縮的民族主義的另一種說法)，才是以維持報紙的主導權為中心任務的意識型態。

殖民地的韓國語報紙，以這樣的方式持續著與其他文化主體緊繃競爭的關係。在報紙版面中各被分割配置的詩歌文學的種種次文類，便是為了與他們競爭的重要工具。然而此競爭的基本性質，並非為了得到勝利，而是為了生存。

¹⁹ 金炳九指出，三〇年代的古典復興論係「殖民地帝國的衍生論述」形成的。見金炳九，〈古典復興的企劃與「具有朝鮮性」的形成〉，《具有朝鮮性的形成與近代文化論述》(首爾：昭明出版社，2007年)，頁39。金炳九的判斷提示了理解三〇年代《東亞日報》「新春懸賞」之意義的一個面向。

²⁰ 林和，〈曇天下的詩壇一年〉，《文學之邏輯》(1940年)，《林和文學全集》第3卷(首爾：昭明出版社，2009年)，頁488。

生存只有透過均衡的維持才能得到保障。殖民地的韓國語報紙，必須審慎計算與殖民權力對立、其對立又不至進入危險狀態的那一個平衡點²¹。

進入三〇年代，致力於不讓大眾的啟蒙論述轉化為明確的反殖民政治性的理由，便與這樣的均衡調節相關。在這個過程中，與拒絕均衡並將競爭層級導入國家之獲得層次的勢力聯合，是必然崩壞的。林和在「藝術大眾化論爭」中指出「合法性表象體系不是屬於社會主義者的」這樣的主張，竟不消多少時間便得到應驗。

四、「不穩」的界線及其裡外

殖民地的文本開始正式產生的 1920 年以來，檢閱官從未放下對詩歌文學的矛盾²²。那意味著在殖民地檢閱中，詩歌文學並不享有特權²³。在《諺文新聞詩歌》資料收集之始的 1930 年 1 月 3 日，在《東亞日報》刊載了叫做「血灘」的一首時調〈見詩之刪除〉。「誰在歌唱呢。成為空白的血之歌。／歌一消亡，活字令人心酸／遍布的痕跡，讓我的心更加哀戚」。在這首時調中，「血之歌」這樣的詞彙，以駭人的意象令人鮮明地想起許多在檢閱中被剝奪了生存機會的詩歌的不幸命運。

「訃告，機關車君 七月四日 醫治無效 茲以訃告 七月八日。」1930 年 8 月，KAPF 詩人金昌述詩集《機關車》因檢閱而無法刊行，將之以悔恨的訃告寄給親友金炳昊²⁴。第一本詩集《熱狂》就已經被檢閱扣押的金昌述，到了第二本詩集又無法出版，將這樣的挫折比喻為自己的死亡。金炳昊在介紹這篇訃告的文章裡，將本人與金海剛、金昌述往返的關於《機關車》之檢閱的私

²¹ 關於出版資本的自我檢閱問題，參照韓萬洙，〈關於透過殖民地時代之出版資本理解的文學檢閱〉，《國語國文學》第 131 輯（2002 年）。

²² 1919 年，三·一運動之結果造成所謂「文化政治」的緩和局面。其影響是，兩種韓國語報紙與許多雜誌的創刊得到許可。然而殖民地出版品刊行的許可，反過來說，意味著檢閱對象的擴大與檢閱強度的深化。參照韓基亨，〈文化政治期檢閱政策與殖民地媒體〉，《重讀近代》（首爾：歷史批評社，1996 年）。

²³ 被加於近代詩上殖民地檢閱的實際例子，參照檢閱本《沈熏詩歌集》，沈熏紀念事業會編，《那一天來臨的話》（首爾：다림，2000 年）。

²⁴ 金炳昊，〈被葬送的詩集〉，《朝鮮之光》第 92 號（1930 年 8 月），頁 28。

人信件公開。在這些信件中的語句之中，鮮明地表現出金昌述隨時間流逝而愈發強烈的絕望感。

(一) 《機關車》是昌述兄編輯完成而提出的，如何才能夠順利刊行呢。

海剛

(二) 與海剛共裝的詩集《機關車》，打算在近日裡提出原稿看看，但能不能通過是個問題。昌述

(三) 將《機關車》提出了，只期望能夠順利通過。雖然有六成的希望，但我也沒有把握。昌述

(四) 提出詩集《機關車》早就過了一個月了，卻沒有消息。昌述

這樣的檢閱，在殖民地文學者的言語之中屢屢被描寫為召喚死亡的致命加害。《諺文新聞詩歌》的製作，便是和對詩歌文學的持續檢閱重合的一個現象。如果說日常的檢閱是集中於個別文本，《諺文新聞詩歌》則是為了對付「殖民地詩歌」這個整體文本而制定的策略。也就是說，《諺文新聞詩歌》是以殖民地報紙的詩歌文學為對象作成的事件調查書。在此調查書中，參與事件的主體的痕跡，被以種種方式保留下來。而試著追蹤這些痕跡，便是本稿的目的。

二〇年代中期到三〇年代中期的十多年之間，報紙的詩歌不得不歷經激烈的變化。可以將之理解為，詩歌文學不但與殖民地報紙，乃至社會主義運動、作家與讀者、以及殖民權力等多樣主體，有著深刻的利害關係。

一部分的社會主義者們，為了自我理念的傳播擴散，利用了詩歌的可能性。文學大眾為了確認近代主體的自我意識，投入報紙的文學場域。殖民權力以生產「不穩文書」的方式，介入了報紙的詩歌。報紙一面計算著社會運動勢力與大眾、以及殖民權力的動向，調節詩歌文學政治性表現的強度。在這過程之中，報紙也有欣然接收高強度的檢閱與刪除，也有面臨接受以生存作為代價接受自我檢閱的屈辱情況。

到了三〇年代中期，報紙文學場域中的詩歌文學裡可見的政治性顯著地衰弱。殖民地民間報紙的文藝空間雖然擴大了，但進入三〇年代，報社之間加速

了的競爭才是重點²⁵。報紙的詩歌文學，再也不能直接吸納殖民地大眾的政治與文化欲望。

於是，以《諺文新聞詩歌》的製作為起點，民間報紙進行的反殖民國民文化的可能性，漸漸地萎縮了。然而問題不止於此。由於檢閱基準的樹立以及檢閱的強化，在殖民地合法發表的所有詩歌中的不穩要素是否被消滅，還有必要進一步探問。

若殖民地檢閱機構注意的「不穩性」的實體，是抗拒與帝國同一化而構成的殖民地人民有意識的「再認同」的手段的話，那麼讓這樣「再認同」成為可能的語言體系，有在檢閱當局定義的範疇之外被構成的可能嗎？

發表於為了製作《諺文新聞詩歌》而進行調查的三個月間的李活（李陸史）的〈馬〉、李春熹的〈鼾聲〉²⁶、沈熏的〈對老師的思念〉、〈野草〉的〈在月夜的大街〉等詩，從現在的角度來看有充分的「不穩」因素，但卻沒有成為《諺文新聞詩歌》的收錄對象。

這種詩歌的存在，一方面說明了檢閱本身的不完全性，也顯示了確固的檢閱基準設定，在某些情況成為在基準之外產生出新領域的契機。基準的強度愈高愈造成絕對性的感覺，某些情況下也顯出了對於界線之外的言語在解釋上的無力感。

這樣的情況，除了要求我們理解《諺文新聞詩歌》的歷史作用，更顯示出對殖民地檢閱進行根本性考察的必要。也就是說，對於政治主權與文化主體性的想像、或拒絕隸屬於帝國國家權力的態度——諸如此類的殖民地人民多樣的社會自我意識，必須設法摸索不與朝鮮總督府的「檢閱基準」牴觸所能表達的可能性²⁷。

²⁵ 朴用圭，〈日帝下民間報紙記者集團的社會特性之變化過程研究〉（首爾：首爾大學博士論文，1994年），頁110-112。

²⁶ 《朝鮮日報》，1930年1月4日。此作品是1930年《朝鮮日報》「新年懸賞文藝」詩部門的入選作品。

²⁷ 此論文的初稿發表的學術會議（「殖民地檢閱與近代文本」，首爾：成均館大學東亞學院，2009年2月7日）的討論人千政煥，關於詩歌文學之大眾性具有的歷史意義，提出筆者沒有思考到的一些點。儘管不就此問題充分檢討，為了作為今後討論的線索，在此追加一些篇幅。千氏要求筆者省察報紙產生的大眾文學場域本身的獨自性，以及反權力的影響力。超越由殖民權力與菁英文學者們共有的理念與解釋的獨占而引起的對於文本

「檢閱基準」是檢閱機構內部的語言，也是非對稱性資訊的典型事例。不使人民知道什麼受到檢閱，藉以運作被檢閱者的自我檢閱，是國家檢閱最終極的目標。然而隨著檢閱事例的累積，被檢閱者們自己也開始建構「經驗性的檢閱標準」。我們也要考慮這樣的被檢閱經驗的反覆，對殖民地人民的語言創造的積極影響。若能在邏輯上證明這層關係，那麼所謂檢閱標準化，不過是帝國為了隱藏面對自己所生產龐大文本的不可控制性而做出妥協的一個象徵體系——這樣的學術假設，最終也可以得到成立。

單一的價值判斷，要求我對於構成大眾詩歌文學場域的社會脈絡與作用的所有面貌，進行新層次的積極評價。在殖民地惡劣的媒體環境之中，難道沒有將一年三千篇以上、刊載於報紙版面的詩歌作品的持續性投稿，解釋為將近代文學從國家與菁英的手中下放到大眾自身之中，作為連續慶典的可能性嗎？千氏的提示所觸發的問題是，將大眾的集團性及他們產生的大量文本解釋為社會非可逆性的再建構主體性契機的一個線索。將大眾的行為作為解除國家權力／支配菁英的獨占空間之力量來理解，這樣的態度是必要的。此時重要的，並非基於「文學主義」與「理念基準」由上而來的評價，而是發現大眾文學場域自身具有的運動方式及運作於其中的感性特質。為了說明在檢閱系統之外形成的殖民地大眾文學，必須追尋特有的視角與方法的創造。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千政煥，《近代的讀書》（首爾：푸른역사，2003年）。
- 朴憲虎，〈從同人誌到新春文藝——登壇制度的權力變換〉，《作家的誕生與近代文學的再生產制度》（首爾：昭明出版社，2008年）。
- 沈熏紀念事業會編，《那一天來臨的話》（首爾：차림，2000年）。
- 林和，《林和文學全集》第3卷（首爾：昭明出版社，2009年）。
- 金炳九，《具有朝鮮性的形成與近代文化論述》（首爾：昭明出版社，2007年）。
- 金錫烽，〈殖民地時期《朝鮮日報》新春文藝的制度化樣相研究〉，《作家的誕生與近代文學的再生產構造》（首爾：昭明出版社，2008年）。
- 前田愛著，劉恩京、李元熙譯，《日本近代讀者的成立》（首爾：이룸，2003年）。
- 洪廷善編，《金八峰文學全集 I》（首爾：文學與知性社，1988年）。
- 韓基亨，〈近代語的形成與媒體的語言策略〉，《文藝公論場的形成與東亞》（首爾：成均館大學出版部，2007年）。
- 韓基亨，《重讀近代》（首爾：歷史批評社，1996年）。

二、單篇論文

- 朴憲虎，〈文化政治期報紙的位相與反檢閱的內在邏輯〉，《大東文化研究》第50輯（2005年）。
- 朴憲虎、孫成俊，〈以統計看《朝鮮出版警察月報》的世界像〉，《殖民地檢閱與近代文本》，「首爾：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學術會議」論文集（2009年2月7日）頁86-87。
- 李惠鈴，〈1920年代《東亞日報》學藝版的形成過程與文學的位置〉，《大東文化研究》第52輯（2005年）。

鄭根植、崔暎姬，〈圖書課的設置與日帝殖民地出版警察的體系化 1926-1929〉，
《韓國文學研究》第 30 輯（2006 年）。

韓基亨，〈殖民地檢閱政策與社會主義關連雜誌之政治力學〉，《韓國文學研究》
第 30 輯（2006 年）。

韓基亨，〈殖民地檢閱的性質與近代文本〉，《民族文化史研究》第 34 輯（2007
年）。

韓萬洙，〈關於透過殖民地時代之出版資本理解的文學檢閱〉，《國語國文學》第
131 輯（2002 年）。

三、學位論文

朴用圭，〈日帝下民間報紙記者集團的社會特性之變化過程研究〉（首爾：首爾
大學新聞學博士論文，1994 年）。

